

• 发现上海丛书 •

— 南京路 —

东方全球主义的诞生

Nanjing Road: The Birth of an Oriental Globalism

李天纲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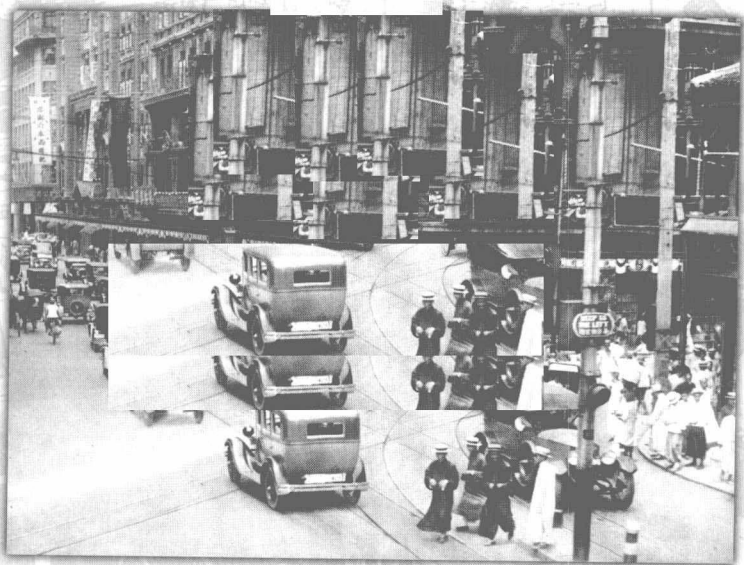
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南京路

东方全球主义的诞生

李天纲著

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南京路:东方全球主义的诞生/李天纲著. —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2009

(发现上海丛书)

ISBN 978-7-208-08738-5

I. 南... II. 李... III. 商业中心—商业史—上海市
IV. F727.5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37408 号

责任编辑 赵荔红

美术编辑 杨德鸿

封面设计 董一瑜 蔡新华

内文配图 赵荔红

· 发现上海丛书 ·

南京路:东方全球主义的诞生

李天纲 著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

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

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6.25 字数 100,000

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~4,250

ISBN 978-7-208-08738-5/K · 1580

定价 20.00 元

引言

1980年代,“改革开放”声浪中,南京路重新得到“中华第一商业街”的美誉。但是,新一代上海市民的“shopping”,“南京路”已经不是必选。虽然“步行街”上挤满了世界各地慕名而来的游客,南京路的鼎盛却已成为过去,它蜕变为城市里的集体记忆,是近代中国躯体上一块鲜明的胎记。新的金融、贸易、办公、商业中心,在陆家嘴、虹桥、淮海路、南京西路、徐家汇……次第兴起,取代了南京路。近年来,上海有一种说法:“世界人的陆家嘴,中国人的南京路,上海人的淮海路。”换一句话,也可以这样说:年华老去的南京路,沐浴了“鸦片战争”以来150年的“中国经历”,如今它的生命扩展到各区各地,在整个城市延续。

南京路,曾经是上海和中国的“大马路”,一个独大的商业中心。从外滩到西藏路,全长1599米,¹集中了全国最重要的商业机构。如同纽约的“第五大道”(5th Avenue)一样,南京路兼具了购物、贸易、旅游、居住和文化的功能,一看就是那种庞大“商业帝国”的首都。1934年的英文《上海指南》,上海被比喻为“西面的纽约”、“东方的巴黎”。²然而,上海的南京路,却比纽约、伦敦、巴黎、柏林同时期的“大马路”更具有国际色彩,这里汇聚的东方和西方,中国和英美,传统和现代的五光十色,是连当时的欧美大都市也都不具备的。

1945年,衔接南京路的“静安寺路”改名为“南京西路”,“南京路”就改名为“南京东路”。在上海,传统意义上的“南京路”,是指这一段三华里多一点的商业密集街区,它在1930年代已经成形,代表了19世纪以来中国的“第一次现代化”、“早期全球化”。上海在1930年代已经进入了“全球化”,南京路上,曾经诞生了一种“东方的世界主义”,一点也不比西方的“全球化”逊色。21世纪的上海,正是承继了这个传统,开始“再全球化”的历程。南京路,回到世界各大都市之林,正如中国人终于加入了世界各民族之林。

目 录

引言 / 1

“到上海去” / 1

从江南来 / 15

维多利亚风 / 35

“中国问题” / 63

都市传奇：哈同的例子 / 83

尘世浮华：“消费主义”之蛊 / 97

“新生活—新文化” / 11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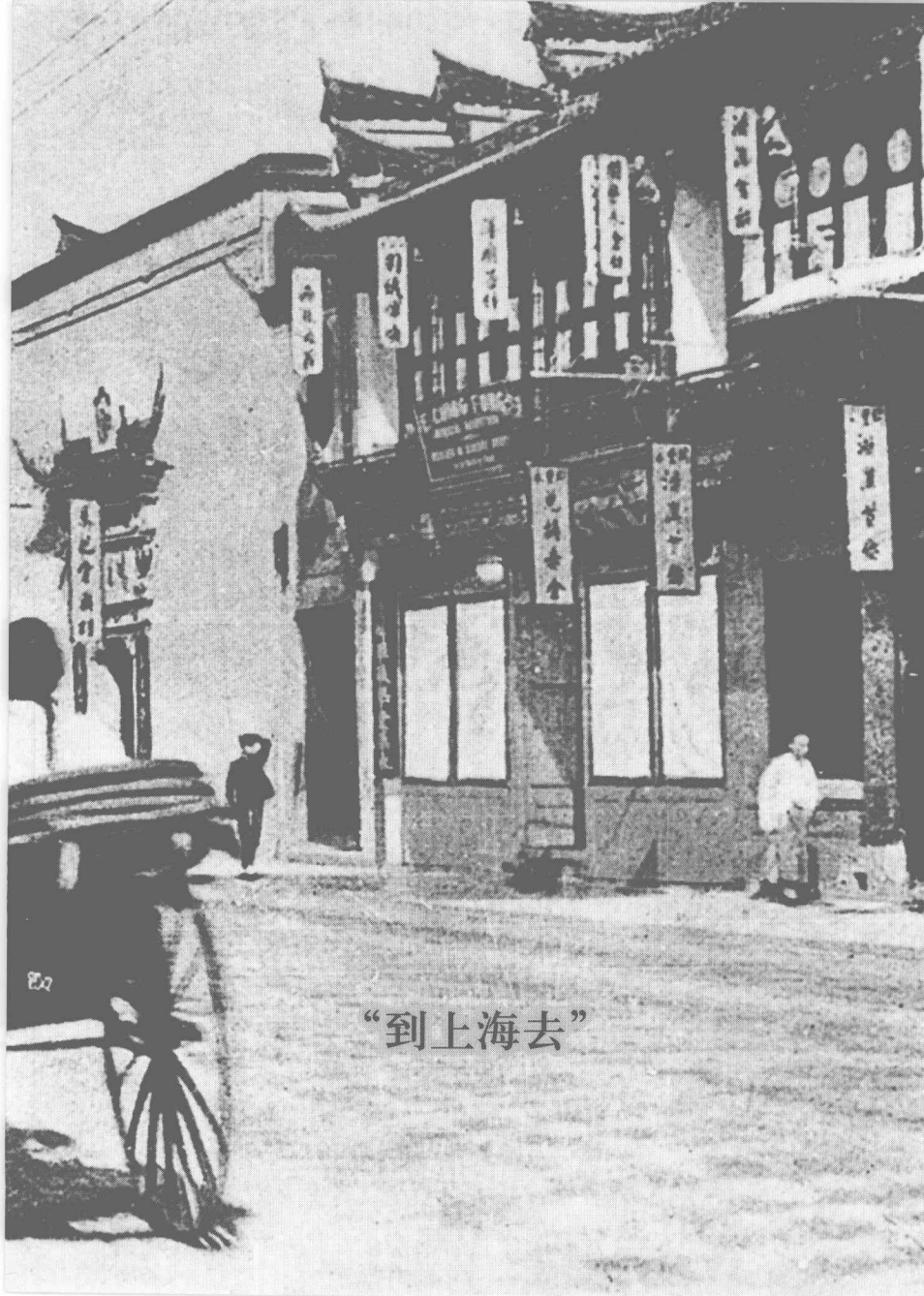
市民社会 / 127

战争 / 139

“社会主义改造” / 155

“再全球化” / 171

跋语 / 191



“到上海去”

鸦片战争以后，中英双方在《南京条约》（1842年）中商定“五口通商”，其中第二条规定：“自今以后，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，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、福州、厦门、宁波、上海等五处港口，贸易通商无碍。且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、管事等官，住该五处城邑，专理商贾事宜，与各该地方官公文往来。”³ 这一项条款，在中国催生了五个“通商口岸”（Treaty Ports）。一个超大规模的大都市——上海，在五个城市中脱颖而出，引领中国。开埠后的160多年间，正是上海，带领着一个庞大民族——艰难转型。

1843年11月8日，为了落实“开埠”，英国首任驻上海领事巴富尔（George Balfour, 1809—1894）乘坐军事船只“麦都萨号”（Medusa）从杭州湾口上的舟山岛到达上海。巴富尔原籍苏格兰，出生在东印度公司的世代军人家庭。参加鸦片战争，崇尚“炮舰政策”，是那种野心勃勃的东方殖民者。次日，带着胜利者的倨傲和叩关者的狡猾，他和地方长官，即“江南海关分巡苏松太兵备道”（又称“上海道台”）宫慕久展开谈判。谈判的内容包括：领事馆设址哪里？外国人住在哪里？侨民和上海人混居在老城内，还是划一个特区另行安顿？如果是设立外国侨民专门居住的“租界”，这个地方划在哪里？还有，用怎样的方式把上海本

地人的土地弄过来，租给外国人？⁴

“道台”是个出面周旋、打打哈哈的人物。清朝非常重视上海“开埠”，当天，江苏巡抚孙善宝、江南提督尤渤赶来上海；钦差大臣耆英、两江总督璧昌坐镇南京。双方已成竹在胸，经过二三年的交战，大家都疲惫到不愿再作计较，谈判进展神速，签约之快，破了纪录，可称“上海速度”。1843年11月14日，巴富尔用英文公布了英租界第一号布告；11月17日，英租界的范围正式划定，英文版的《上海土地章程》（*The Shanghai Land Regulations*）公布，章程条例当日生效。官慕久则在11月29日，向本地居民公布了中文版《上海土地章程》，宣布正式开埠。道光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（1843年11月13日），钦差大臣耆英向皇帝报告说：“统计五口，应以广州为首，上海为尾，将来贸易，似亦惟该二口为最旺。”⁵参与谈判的高层人员心里清楚：上海的命运，在四五天里改变了。

1833年，英国取消了垄断东方贸易达230年之久的“英国东印度公司”（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, 1600—1874）的特权，商人们各寻门路，激烈竞争。维多利亚女王继位（1837年）前，欧洲又涌起了新一轮的东方大冲动。伦敦《泰晤士报》说，一旦中国开放，它就是“第二个印度”，到中



1884 年的南京路劳合路 (今六合路)



1883 年的南京路西段

国去的呼声很强。英国商人包了一艘探险船“阿美士德号”(Amherst)，在 1831 年、1832 年、1833 年，连续三次调查北中国沿海，摸清了地理、人口、物产、港口、历史、宗教、风俗、文化情况。落脚在澳门、广州的各国商人们，弄清楚了一个事实：“北中国”(North China) 地方，有一个城市叫上海，它是内贸巨埠，将来极有可能执外贸之牛耳，超过澳门和广州。葡萄牙人、荷兰人、西班牙人、英国人熟悉的港口，如澳门、厦门、宁波……都是海口城市，重要性都不及藏在大清帝国铁幕后面，黄浦江上的河口城市——上海。

19 世纪的上海，位于长江支流黄浦江的中游，距长江口近 30 公里。城厢北缘 1 公里，著名的吴淞江掠境而过，通往《马可波罗游记》描绘的“天堂城市”苏州，后来的侨民称它“苏州河”(Soochow Creek)。上海境内，盈城皆水，有无数条大小河浜，联通起不远处的太湖、大运河、长江。在没有现代公路、铁路的时代，通过水网交通，江南地区出产的丝绸、茶叶、瓷器、布匹和粮食，可以快捷、便宜地运到“十六铺码头”，发往南北。上海，控江扼海，位于大清帝国海岸线的中央，地属江苏行省的松江府，乾隆以来就是个优良的港口城市，号称“南吴壮县”，展现出一幅吞吐无限的贸易前景。

“到上海去”，是广州、澳门、马六甲、加尔各答、孟买商人们的口头禅。⁶商人们急不可待，早在5月8日，就有3艘美国船，2艘英国船，乘着太平洋上强劲的春日季风，从广州、澳门一路北上，到上海来闯关，被劝阻在黄浦江口的吴淞炮台。⁷十月金秋，又是劲风鼓帆的季节，开埠第一天（17日）的清晨，第一艘汽轮船就急吼吼地驶入黄浦江，停靠在十六铺码头上。至12月31日，6周以内，一共有7艘船只到达上海。7艘商船，最大的汽船“伊利萨·斯蒂沃号”（Eliza Steward），吨位423吨；最小的帆船“玛兹帕号”（Mazeppa），吨位171吨。7艘船只的平均吨位是281吨，平均船员25名。他们在上海十六铺城厢内外，购入货物的总价值是433 729元，出售货物的总价值是146 072元。⁸第一周贸易，英商严重出超，购入的“江南货”（棉布、丝绸、茶叶、瓷器、家具、工艺品）比出售的“西洋货”（鸦片、洋布、钟表、钢琴、餐具刀叉）多得多。1843年，“Made in Britain”，暂时还比不过“Made in China”。

中国不是印度，清朝依然强大，仍然足以把外国人管控起来。自明朝以来，除了朝廷的四夷馆、理藩院、市舶司定期接待藩属朝贡地区的使臣、商人外，一概不允许外国人住在内地。1553年，北京给广东省一条特殊政策，在辖

境澳门半岛南端——临海的“南湾”，让葡萄牙商人上岸居住。澳门当局沿用了唐、宋时期广州的“蕃坊”制度，把葡萄牙商人圈管起来，与华人隔开。葡萄牙人设立“议事会”（Senadoda Camara），接受香山县衙门监督，内部自理。北京的态度是：“以华治华，以夷制夷”，避免“华洋杂处”，减少侨民与中国人之间的纠纷。“诸化外人，同类自相犯者，各依本俗法；异类相犯者，以法律论。”⁹“华洋分居”下的“化外开恩”，只在中国出现，和非洲、美洲和印度的“殖民地”都不同，于“地理大发现”以后的世界历史上独树一帜，学者称之为“澳门模式”。¹⁰“澳门模式”不是“殖民地”，而是中央政府授权的“侨民自治”。宽宏大度的帝国意识背后，藏着一种不屑为伍的鄙夷。于是，从外国商人看来，这种“怀柔远人”，实在也是歧视性的“种族隔离”。

上海开埠，沿用了“澳门模式”。同时“开埠”的广州、厦门、福州、宁波，程度不等地出现了乡绅领导的“反入城”运动。老城里的本地居民，不让“夷性犬羊”的“番鬼”进城！上海的抵制，是“五口”中最温和的。一位姓顾的商人，为了揽生意，愿意把城里姚家弄的大宅以400元/年的租金借给巴富尔，做英国领事馆，邻居们强烈反对。¹¹上海城里的“文明人”，坚守“夷夏大防”，不愿意和满身牛羊肉膻味的



1890 年的南京路，左侧为会审公廨



1880 年，南京路上的早期会审公廨

“夷人”同住。于是，道台就劝说英国人自己弄一块地方：“一则洋人如分居各处，则领事管理困难；二则有领事裁判权一事，已对保护外人有所掣肘，今者再令其各处分住，保护必尤难见功效。”¹²于是，上海沿袭了“澳门模式”，开辟租界，“华洋分居”，正式开埠。

澳门再造！？这想法让巴富尔喜出望外！兴之所至，巴富尔从上海县城北面一个叫“李家场”的地方出发，沿洋泾浜（南）、黄浦江（东）、苏州河（北）和界河（今江西路，西），信马由缰，划了大大的一圈，定下了“英租界”（British Settlement）的四界。这位崇尚炮舰政策的东印度公司海军分子，见水就兴奋，得意地说：在这块四水围成的租界里，“我们的海军可以停泊。在这些战舰上，可以看到，必要时可以感到我们（不列颠）的力量。我们的政策是通过掌握这些大河，逼迫中国政府提供公正和适当的环境，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我们商务关系中的安定。”¹³巴富尔不害怕“种族隔离”，他坚信英国商人之精明，加上驰骋大洋的“坚船利炮”，一定能够进入中国内地；巴富尔更不担心“华夏歧视”，他心里想：谁歧视谁，还未可知。

19世纪的英国，不是16世纪的葡萄牙！清朝以为把闯进来的“西洋人”安顿在北门外的那片稻田、乱坟场和滩

地里，是推祸水出城，其实正中了“冒险家”们的下怀，为渊驱鱼。初期，欧洲人在“厉鬼出没”的北郊城外，日子确实不好过，活像“鬼子”。最早的租界居民之一，英国著名植物学者，茶叶专家福钧（Robert Fortune, 1812—1880）头两年住在简棚里，他描述说：“每值晨雨，则衣被尽湿。天雪，则六出飞舞，自窗隙而进。”¹⁴ 然而，“太平天国”（1851—1864）运动之后，清朝崩解，老城凋敝，华界衰落，“租界”却日长夜大，尾大不掉。“英租界”（British Settlement, 1843）、“美租界”（American Settlement, 1848）和“法租界”（Concession Francaise, 1849），贸易繁荣，号称“北市”，超越“南市”。

1860年代，沿黄浦江岸线地带，一长串东印度公司“大班”风格的大楼，迅速地建造起来，称为“外滩”。与外滩垂直，比外滩更长，出现了一条向西延展，侵入华界的宏大马路“南京路”。如果说一字排开的“外滩”，承接着来自东亚、东南亚、南亚、西欧和北美的全球风云，那么呈“丁”字状深入中华腹地的“南京路”，凿通了一条通往江南的通衢大道。“世界”和“中华”，在“南京路”相遇。人类“全球化”（globalization）的历史，在一个“民族主义”（nationalism）的时代，呈现在上海的南京路——一种非常

特殊的“地方文化”(local culture)中。“地方—民族—全球”，这里是中国“走向世界”的“三重门”，这里是世界“打开中国”的“金钥匙”，这就是——“南京路”。